

王瑞璞 张湛彬 著

ZHONGGUO
GUOYOU QIYE
ZHIDU CHUANGXIN

中国国有企业
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



中国经济出版社

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创新

王瑞璞 张湛彬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王瑞璞、张湛彬著.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1

ISBN 7-5017-5362-8

I. 中… II. 王… III. 国有企业-企业管理制度-
研究-中国 IV. F279. 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9163 号

责任编辑：张新安

封面设计：蓝鲸设计室

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创新

主编：王瑞璞 张湛彬

*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2. 25 印张 300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3000

ISBN 7-5017-5362-8/F·4315

定价：25.00 元

前言：国有企业改革 和发展的若干问题

王瑞璞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进的历史进程中，在扩大对外开放和加入 WTO 的新形势下，推进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已成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艰巨任务。建国以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已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就此问题，我们结合对青岛双星集团、大庆石油管理局、上海贝岭公司、内蒙伊利集团等国有企业的调研谈一些若干思考。

一、国有企业的形成发展及其历史地位

近代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快速地走到世界和时代的前头。古老的中国在明清之际落到了后面，从此噩运不断，备受列强的侵略和欺凌。中国怎样赶上去是摆在所有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人们面前的一个重大命题。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和比较，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中国的出路在于努力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但是，从晚清洋务运动以来直到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以来，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发展现代工业的努力，总的说来，收效甚微。直到 1949 年，现代

工业在整个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只不过占 17%。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的肩上。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起,在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同时,也确定了为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而奋斗的目标。把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责任承担起来的主要力量是什么?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软弱,经济上也过于弱小,在旧中国,它完全没有能力承担起中国工业化责任,在新中国,它的力量虽然在最初几年得到一定的增长,也远远承担不起主角的责任。因此,可以说除了国有企业之外,在中国没有任何其他经济力量,能够承担起这个历史责任。

我国国有企业有三个来源:一个是老解放区的公营企业。这一部分数量很小;二是原来的官僚资本企业,新中国建立之初即被没收,这一部分最大,在当时全国工业、运输业的固定资产总值中属于官僚资本的占到 80%;三是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逐步改造成为基本上属于国有企业的原资本主义企业。这一部分也不大,新中国建立时在全国工业、运输业固定资产总值中只占 20%。

共和国的工业化,要充分发挥原有公私工业的作用,主要是靠新建大批国有企业及改建扩建若干国有企业。这些新建和改建扩建的国有企业,是在经济恢复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在十个五年建设计划中,由国家投资建设起来的。这些国家投资,使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逐步成长壮大,是中国工人和农民对国家的贡献。目前据有关部门测算,我国国有企业资产存量合人民币约 8 万亿元。

在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大跃进”的错误以及后来的十年内乱,使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步伐大大放慢。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策,从此,改革

开放使我们国家和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

首先,我们逐步明确,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现阶段最能促进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包括外资经济、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在工业领域,几乎从无开始,20多年来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对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它们虽然不属于主体,但确实属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我们逐步明确,作为国民经济主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除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国有经济外,还有改革中的原有集体所有制经济和正在发展中的各种新的公有制经济形式,这些也都属于主体,都是应该大力发展的。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完成的年增加值在全国工业年增加值中所占的比例,已经差不多接近一半。这对我国工业化特别是农村工业化是了不起的贡献。

再次,我们逐步明确,国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也要不断进行探索。这个变革的方向,就是使国有企业从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作为政府机构附属物的生产单位,转变为面向市场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的发挥,不单靠国有独资公司,还要在相当范围内靠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从而增强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国家参股而不控股的混合经济,它的发展包含着其中的国有股份的发展,也是有利于壮大国有经济。

经过改革开放,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批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成长壮大,技术装备水平明显提高,以国有企业为主生产的一些重要产品的产量跃居世界前列。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下,国有经济的总体实力进一步增强,在国民经济中继续发挥着主导作用,并且一直是

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有力地支持了国家的改革和建设。尽管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中遇到过并且还面临着很多困难,从大处看历史,从总体看现实,我们认为,国有企业在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中的历史地位并没有变。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始终要依靠和发挥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新中国 50 年的历史,前 30 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条,改革开放这 20 年的历史,继续证明了这一条。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控股的混合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制度的重要经济基础,是国家引导、推动、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看不到国有经济的这些重要作用,以为改革开放了,就可以不要国有企业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艰巨任务可以完全依靠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来完成了,这是不对的。看不到 20 年来非国有经济在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中发挥的作用,仍用老眼光看问题,以为只能靠国有企业,压制、排斥多种经济成份,不要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这同样也是错误的。

二、正确认识和分析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

新中国建立 50 年来,国有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总体实力不断增强,管理的技术水平逐步提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国有企业在前进中也出现不少问题。当前,国有企业体制转换和结构调整正处于攻坚阶段,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随着渐进改革的深入而集中暴露出来。这些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为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效益下滑,亏损面逐步扩大。国有企业亏损加剧的情况大约始于 80 年代中期。从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亏损情况看,“五五”计划期间年均亏损额为 50 亿元,“六五”期间为 37 亿

元，“七五”期间为 145 亿元，“八五”期间年均亏损额上升到 442 亿元。国有企业亏损不断增加的问题越来越引起各方面的关注，上上下下抓扭亏，做了大量工作，但未能从根本上遏制效益下降的局面。“九五”前三年情况更加严重。国有大中型企业亏损额“九五”前三年分别为 555 亿元、589 亿元和 670 亿元，亏损面分别为 37.3%、40.5% 和 45.1%，持续扩大。1999 年，经过债转股等多方面的艰苦努力，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出现了恢复性回升，但要解决国有企业盈利水平低，实现经济效益全面的根本性的好转，工作仍然十分艰巨。

第二，不少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相当一些企业产品缺乏竞争力，开工不足或严重不足，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大量设备和生产能力闲置。据国家统计局对 1997 年全国重点企业的 67 种主要工业产品现有生产能力利用情况的统计，生产能力利用充分和比较充分(80%以上)的产品仅有 22 种，生产能力利用不足(60% – 80%)的产品 22 种，生产能力利用严重不足(60%以下)的产品 23 种，各占三分之一。一些企业产品大量积压，库存不断增加，资金周转放慢，企业应收账款持续增长。1998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产成品 3427 亿元，应收账款净额 7721 亿元，两项合计达到 11149 亿元，占流动资产比重达到 38%，远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企业欠息欠税等情况也有增无减。

第三，企业资本结构不合理，债务负担沉重。1985 年开始逐步推行“拨改贷”，“七五”和“八五”时期大批生产性基建和技改项目，主要是靠银行贷款搞起来的。最突出的问题是企业缺乏资本金，债台高筑，财务费用大增，很多项目投产之日就是亏损之时，不少企业靠自身能力根本无法偿清债务。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由改革初期的 30% 多上升到 65% 以上，每年上升约 2 个百分点，大批企业因此陷入困境。1996 – 1998 年，国有工业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65.1%、65.4% 和 65.3%。这主要是根据企业账面资产计算的，根

据有关调查,如果扣除企业普遍存在的损失挂账虚数等因素,企业资产负债率应在 75%左右。这样的负债水平,明显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也大大高于国际正常水平。尽管国家正在采取多种方式帮助企业增资减债,但很多企业并未建立资本金补充机制,问题依然相当严重。

第四,技术设备老化,改造创新能力不强。大批企业技术进步缺乏动力,资金短缺,人才匮乏,严重制约企业的竞争力。突出表现在,企业生产技术水平不高,产品质量档次低,高附加值产品比重小;技术基础薄弱,许多重要行业生产技术装备水平和经济技术指标明显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技术开发机构、经费和开发力量与国际大公司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我国关键生产技术的掌握和应用以及大中型企业技术水平普遍要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 5—10 年。能源消耗普遍比国际先进水平高 40%以上,资源利用率低 20%,成本高 30%,可靠性和寿命性低 20%。据对国有企业为主的大中型企业 1180 种主要专业技术设备技术水平的普查,1995 年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仅占 26.1%,国内一般水平和落后水平的分别占 33.4%和 12.8%。2.4 万家大中型企业中,有技术开发机构的企业仅为 7732 家,不足三分之一;有技术开发活动的 11212 家,不到一半;大部分企业只是一个生产车间。国有企业技术改造投资占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多年来逐步下降,企业因此缺乏技术改造能力。

第五,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不合理,战线过长。长期以来,国有经济几乎各行各业无所不包,建设战线长,覆盖领域广,资金使用散,企业规模小。特别是那些规模效益显著的行业,如机械、电子、汽车、石化、钢铁等,大多数企业不能达到合理经济规模,企业大而全小而全,没有形成专业化分工和社会化协作体系,生产集中度很低。把国家有限资金配置在大量中小企业方面,不仅没有发挥国有经济可以集中力量发展重点行业和大型企业的优势,而且

丧失了企业的规模效益和竞争能力。虽然近几年来一直在进行调整和重组,也取得一些进展,但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改变。计划经济时期铺摊子较大的产业,如纺织、机械、冶金、军工等行业的一批国有企业,很难参与市场竞争。近年来,国家实行抓大放小,在发展大企业同时,采取多种形式放开搞活小企业,开始见到成效。国有中型工业企业约有 1 万家,总资产 1 万多亿元,职工 1 千多万人,亏损大,债务高,冗员多,负担重,人才缺乏,困难更大。

第六,富余人员多与就业压力大并存,社会负担沉重。国有企业共有职工约 8000 万人。其中,国有工业企业就有近 4000 万人,据估算,富余职工占三分之一左右,约有 1100 - 1500 万人,每年用于这部分职工的支出大约为 550 - 570 亿元,大大高于 1997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全年 450 亿元的利润额。离退休职工 1000 万人,相当于国有工业企业在职职工的四分之一,全年需支付离退休金和福利费 600 多亿元,这一块费用也高于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额。国有企业长期承担办社会职能,费用十分庞大。据有关部门统计,1998 年,全国国有企业办的中小学有 1.7 万所,教职工 63 万人,在校生 732 万。全国工业及其他部门自办医疗卫生机构 91000 多个,拥有病床 62 万张,工作人员 112 万人,其中医院约 7300 个,病床 60 万张,工作人员 79 万人。国有企业用于办学校和医院等项支出约占销售收入的 4% - 5%,负担十分沉重。

国有企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是长期形成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必须进行全面的、历史的、科学的分析,总的来说,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分析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不易消除。我国正处于由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过程中,一些政府部门和企业还没有完全摆脱旧体制的影响,管理僵化,机制不活,观念陈旧。企业在生产经营、劳动人事、收入分配、产品开发、科技进步等方面,没有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有效机制,企业缺乏生机和

活力。例如,在生产经营方面,尽管企业改革已经 20 多年,但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尚未完全落实,不少应由企业自主决定的事务还必须由一些部门审批和控制,企业难以自主经营,决策慢,效率低,难以与变化多端和竞争激烈的市场相适应;同时也有不少企业严重依赖政府,习惯“等、靠、要”,企图通过政府各种优惠政策,获取生产经营优势,而不是苦练内功,在加强和改善经营管理上下功夫。在领导体制方面,国有企业尚未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产权不清,权责不明,决策随意,管理松弛,监督不力,无人负责。在收入分配方面,大锅饭、铁饭碗基本打破,但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尚未形成,既有凭借垄断经营获得过高收入的问题,也有收入报酬与责任、效益、业绩严重脱节的问题,不能调动职工和经营者的积极性。在技术进步方面,企业长期投入不足,缺少自我发展和开发创新的压力和动力,鼓励政策不明确、未落实、缺乏力度。

第二,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过渡期的必然结局。经过新中国 50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20 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发展上了一个大台阶,工业化进程步入新的阶段,面临着新一轮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国有经济长期存在的分散投资、粗放经营、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矛盾日益显现,特别是随着高新技术产业兴起和新技术应用,一些传统产业生产能力需要压缩,一批技术设备落后、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企业需要淘汰,部分长期开采、资源枯竭的矿山需要关闭。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出现困难,甚至被兼并、破产、关闭,是不可避免的。许多发达国家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结构调整时期,出现过类似情况。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必然伴随着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企业需要优胜劣汰。此外,还有相当一批三线企业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布的点,在新的形势下,调整和改组的压力甚大,面临的困难更多。

第三,长期盲目多头重复建设后果的严重显露。过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习惯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重投入、轻产出,重外延、轻

内涵，重生产、轻市场，盲目发展、重复建设十分严重，很多行业生产能力大量过剩。这种严重的盲目重复建设，是许多企业产品供过于求，生产经营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同时，这种状况加剧了产业和产品的结构性矛盾，加大了调整难度，也使企业过度竞争愈演愈烈，浪费大量社会资源，有限资金不能用于技术改造和开发创新，技术设备更加落后。

第四，社会外部环境和条件的制约不可低估。长期以来，相当一批国有企业经营不善，长期亏损，或因资源和市场发生变化，企业处于停产或破产状态。但由于旧体制的作用，政企不分，管理僵化，企业只能生不能死，人员和资产无法流动，严重影响国有经济结构调整，也积累了大量矛盾。过去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国有企业承担着大量安置社会就业、离退休职工养老和举办社会福利事业等责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各种所有制企业都要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优者胜劣者汰，国有企业再背上如此沉重的包袱，就很难与其他企业公平竞争，必然困难重重，步履维艰。企业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关闭，需要妥善安置好失业人员。与此同时，社会每年新增数以千万计的就业人员，需要就业岗位；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大批劳动力向城镇转移。

第五，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需要较长的过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前新体制正处于探索和建立之中，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还不够充分，改革措施没有完全到位，新旧体制和机制相互交织，条块分割和封锁依然存在，投资决策和风险责任仍不落实，经济工作中存在很大盲目性，乱上项目，乱铺摊子，大量投资不能发挥效益。有的企业和项目，虽然不是属于重复建设，但是由于没有投入必要的资本金，造成无本经营或资本金严重不足，负债累累，难以生存。此外，国有运营、管理、监督体系也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各级政府部门和企业的权利、责任和利益不清，也严重影响国有资产运

作效率的提高。

第六,全球经济一体化加快和市场环境的变化。面对加入WTO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有企业参与竞争的确面临一系列问题,而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世界经济进入调整期,增长相对趋缓,也造成国内市场出现明显阶段性变化,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提高,大量生活日用品消费量达到一定水平,耐用消费品的居民拥有率明显提高,较大范围商品形成买方市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虽有较大提高,但受收入水平限制,总体消费水平难有突破性的提高。国内外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市场制约作用强化,加剧了部分企业生产经营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国有企业对市场变化反应迟钝,应变能力不强,很容易陷入困难境地。

这些原因的分析,只是初步的。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原因十分复杂,有些问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些问题则互为因果。从总体来看,国有企业面临的矛盾和困难,大多是前进和发展中的问题。通过深化改革,调整结构,国有企业的问题是可以逐步得到解决的。

三、国营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思路

在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思路上,最基本的主要有两条:一是搞私有化,一是完善公有制。这两条路到底哪一条更合适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呢?

我们先来看在中国搞私有化有没有可能性,或者说行不行得通。西方国家摆脱封建桎梏后,踏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到今天市场经济的发展已有数百年,私有化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些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也创造了较为丰厚的物质文明,应当说,马克思推论的资本主义丧钟尚未敲响。既然如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得通的私有化道路在我国是不是就一定能够推而广

之,或者说能够行得通呢?

结论当然是否定的。这种否定的结论一是取决于我国的社会性质,二是受我国的实际情况制约。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党和国家的政权性质决定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党和国家要领导人民逐步走共同富裕道路。我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上一步跨入社会主义门槛的,的确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有些人不了解中国的实际,凭想当然认为如果从新中国建立就走资本主义道路也许社会发展要快得多,这种假设既不符合实际,也根本站不住脚。

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是由我国的国情决定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除了中国共产党以外,没有哪个政党或政治力量能够解决中国的独立问题、土地问题、民主和统一问题。除了共产党以外,旧中国的一切政治力量,或者是压迫工农群众,或者是害怕工农力量的充分发动,或者是没有能力发动工农力量,因此,这些政治力量或者只能依附于帝国主义,或者畏惧帝国主义力量。要战胜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反动势力,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力量,并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做不到的。能够这样做的只有共产党。农民在全国人口中占最大多数,是迫切地要求革命的最大力量,但又由于他们的经济和文化条件而带有某些落后性。如何发动这个力量,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是中国民主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个问题只有共产党能够解决。既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要力量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当然不可能是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不可能是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发展资本主义。

近代中国的历史条件留给中国人的可以说只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继续当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附属国;另一条道路就是实际上我们所已经走过的经过新民主主义达到社会主义的道路。

前一条路是我们不愿走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走上了后一条道路。中外历史证明：人民在历史发展中是能够起主动作用的，但是并不能任意地选择前进的道路，而只能在历史所已经准备下的现实条件的范围内进行某种选择。中国人民所选择的道路，是在可能范围内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道路。

本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世界上掀起了一股“私有化浪潮”，因此有人认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惟一出路就是私有化。果真如此吗？

世界范围内的私有化趋向，主要是国有企业效率低，各国财政负担重，为此，各国都试图通过私有化来解决企业效益和财政负担问题。但是国有企业的效益与负担问题又同其担负的社会使命和特殊任务有关，历来在衡量标准上存有争议，况且为提高企业效益也不一定非采取私有化的方法。那么为什么过去私有化没能形成世界性趋向，而目前却能成为一种思潮呢？首先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战后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结果，公有经济曾一度得到较快发展，但随着 70 年代滞胀的出现，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凯恩斯主义面临困境需要进一步调整的情况下，新自由主义抬头，鼓吹自由放任、减少国家干预的呼声很高，私有化也随之风行起来。其次在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原本就推行资本主义经济机制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受西方国家思潮的影响，掀起了私有化浪潮；另一方面是那些独立后试图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民族主义国家，由于不顾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片面追求公有，扼杀私营经济，实行超越性发展的结果，给经济造成了很大损失。目前主要是通过反思，调整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发展私营经济。最后是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经济条件比前者要优越得多，但过去一段时间里也有追求单一经济和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进行经济改革的教训。在此情况下，它们也都重新校正了自己的社会发展阶段，提出了发展多种经济的计划。因此，从私有化产生的原因分析，既应注

意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又应注意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别。

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随着资本国际化过程的进一步推进，干预和协调将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因此，作为国家干预手段之一的公有经济，理所当然也应得到相应的发展。尽管在有些时候，也会采取短暂的私有化行动，但这只是公、私比例的调节和战略干预重点的某种转移，在当代条件下，没有国家的干预，没有公有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要取得持久协调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这正是西方一些国家在推行私有化时举棋谨慎的原因所在。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虽然由于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在有条件的地方需要依靠私有化来振兴经济，但面对着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国内弱小的私营经济，没有公有经济的支持，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难以得到发展，这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发展条件是完全不同的。

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适时地、合理地调整公、私经济比例，以充分地发挥两者的优势，实现经济协调、稳定的发展，无论在当前，还是在今后都是必要的。但是，片面夸大私有化的作用，甚至鼓吹全盘私有化，不仅违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而且也不符合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其结果必将危害经济的发展。当前，很多国家的公有经济确实都存在经营不善、经济效益低、亏损严重等问题。有人因此提出了全盘私有化的主张。实际上这种主张无论善意还是恶意都是行不通的。我们认为，决定一个企业有无效率的主要因素并不在于它是公有还是私有，而在于怎样管理。根据世界银行资助 1986 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从对 13 个国家和地区国有企业实绩考察的结果看，不仅国与国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就是一国内部，各国有企业经营实绩也很不同。比如巴西公有制企业的经济效益就优于加纳或巴基斯坦的同类企业。印度斯坦机床公司就充满了活力，并保持有良好的实绩，而其他公有制企业就相差甚远。原因何在呢？除了一国的文化、社会、政治影响外，很重要的就是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体制，以及企业

自身的素质及经营管理水平。对此，该报告总结了与所有制无关，而且政府能够施加影响的决定公有制企业实绩的三项重要因素，即公有企业所面对的竞争程度；公有企业经营中财务自主和财务负责的程度；公有企业管理自主权和管理责任制受保障的程度和方式。报告说：“如果能够很好地把握这些因素，就可能大大地缩小公有制企业与私人企业在实绩的差距，并且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在很多情况下能够证明，当时出于基础、战略或社会等方面原因的考虑而建立起许多公有制企业是正当的。”^①

我国全盘走资本主义私有化道路没有可能性，走不动，走不通，也不敢走。这样讲并不刻意表明我们在政治上如何坚定，或我们固守什么成见。我们认为这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我国国有经济比重较大，如果搞私有化，一般化不动，硬化就是搞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少数权贵就可能成为接收大员，从中渔利，社会利益冲突很难避免，这种剧烈变动对我国风险太大，这个险，我们不敢冒。

不走私有化道路，我们就要考虑如何改革和完善公有制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要围绕着公有制的改革和完善来进行，这是根本出路。当然，我们讲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不是反对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相反，我们认为为了有助于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必须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我国的非国有经济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不是一般性发展，而是要大发展，对非国有经济做出的贡献要充分肯定。我们赞成按照严格的法律规定将部分中小国有企业出租、出售和转让，我们认为非国有经济的大发展也有助于推动国有经济的大发展，这种竞争性的加强，也使国有经济在发展中扬长避短，有所为有所不为，以利于集中优势力量，发挥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作用。温室里长不出劲松，国有经济只有在市场的竞争中，只有与非国有经济的共处互利中才有可能获得长足的

^①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在理论战线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